

# 新时代中华文明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检视

---

【编者按】中国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入开展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向中国学界提出了深入研究中华文明史的重大任务，强调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深入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史研究的系列重要论述，中国学界大胆创新，锐意开拓，采取多学科联合攻关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全面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特质、形态及演化历程，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新时代的中华文明史研究，不仅需要发掘新材料、转换新视角，而且需要创建新理论、更新研究方法，从创新性成果中提炼创新性理论，再以创新性理论指导创新性研究。为此，本期圆桌会议邀请四位中华文明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新时代中华文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展开讨论，共同推动新时代中华文明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建设。

---

## 增强文明起源研究的科学性

陈 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当下，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特别反映在夏朝之争及如何认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问题上。目前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的看法往往众说纷纭，甚至针锋相对，特别是中外专家之间的立场判然有别。笔者觉得，许多争论的产生，不是研究对象有什么难度或多么复杂，而是我们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存在不足。我们传统的学术训练一直限于经验性的知识传授，缺乏科学思维和方法论的基本训练，这可能是许多重要争论无法解决，研究水平难以提高的关键所在。

国家起源是历史重建的阐释性综述，与考古学田野发掘和材料整理是两个不同的研究层次。这需要我们完善科学方法，包括问题导向的理论探讨、清晰的概念、严谨设计的方法论和实证主义的逻辑推理。考古学文化是材料整理的基础性研究，是按器物共性归类的归纳法操作，其主要作用是构建文化的年代框架和历史关系。国家与文明探源是高层次的历史重建，需要整合聚落形态和物质文化的变化来探究异质性和等级分化的社会发展过程，并且需要采用演绎法的实证研究来探索物质现象背后的原因。

当下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应该超越一些物质特征，如城市、贵族墓葬、宫殿和文字来定义文明和

国家的起源,去了解这些物质现象形成的社会背景,探索这些现象出现的动力机制。本文想先梳理一下相关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概念,然后讨论研究的方法,最后介绍作为国家形成标志的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的政治机制。

## 一、理论与概念

科学是一种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过程,是一种或然性研究或可信度的考量。因此,科学研究并不奢谈“真理”,也与信念无关。科学是为学者提供研究问题的策略,使得他们能够批判性地利用证据来得到结论。人们称自然科学为“硬科学”,社会科学为“软科学”,这是因为后者不如前者来得精确和客观,而且会被主观理解所渗透。社会科学主要是一类寻找含义的解释性学科,很难做到完全客观。而考古学更为特殊,由于它是从物质文化来间接了解过去,所以它的或然性或可信度更低。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说“考古学是一门难以捉摸的学科。任何坚持某种记录绝对可靠的人,很可能是想欺骗别人,也绝对是在欺骗他自己。”<sup>①</sup>

任何科学都需要理论来指导研究,并说明其观察领域的现象和事件。理论的作用有四点:1. 为材料的解释提供假设或模型;2. 将各种研究联系起来;3. 为概念和变量分析提供框架,使之获得实质性的意义;4. 为材料和问题提供有意义的解释。理论也与准确运用概念的探讨密切相关,概念是对事物的准确称呼,是理解的开始。概念往往又是一种抽象的术语,没有概念也就无法摆脱常识。<sup>②</sup>

我国的文明探源主要是在史学领域里进行的,普遍存在缺乏理论指导和概念不统一的现象。讨论和观点缺乏理论深度,通常是个人经验和直觉的表述,论述也不在意术语的定义和对问题的基本概念保持一致。以致于众说纷纭,难有共识。这种经验主义的操作需要用科学方法来加以控制,这就要了解国际学界相关理论的发展和现状,对讨论的关键概念有明确的定义,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来对各种观察变量进行分析,并通过逻辑推理让材料组成的证据链成为比较可靠的阐释依据。

早在19世纪,欧洲学界便在“科学”与“史学”之间做了区分,将提供规律性认识的科学与历史学区分开来。物理学是规律性学科的代表,它强调一般性的规律概括或总结,而历史学则是描述性学科的代表,它注重特殊事件和具体现象的详述。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伯也强调进化与历史、科学与史学之间的两分,分别将它们视为对人类行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两种解释。但是,这两者并非对立而是彼此互补的。<sup>③</sup>

目前,国际上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流行的是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等提出的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新进化论,<sup>④</sup>其中酋邦是介于平等部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类复杂社会或一个发展阶段,堪比进化生物学中的爬行类和哺乳类。该术语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学界出现了不同的态度。有人尝试用它来探讨中国史前社会的演变,分析前国家社会的特点和性质。有人则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还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史前不存在酋邦社会。许多学者觉得用中国典籍中的“古国”来指称酋邦更加合适,凸显了中国学者在理论和概念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① 戈登·威利《戈登·威利自传》杨明强等译,《南方文物》2019年第3期。

② 肯尼斯·赫文、托德·多纳《社会科学研究:从思维开始》李涤非、潘磊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30页。

③ A. Kroeber, *The Nature of Cul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pp. 63-78.

④ 埃尔曼·塞维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龚辛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首先,中国学界并没有可与“新进化论”比肩的理论模型来讨论中华文明的起源。苏秉琦提出过“三概念”和“三部曲”的观点,<sup>①</sup>这一论述应该是一种历史发展的描述,而非社会进化理论的概括。“三概念”是指“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过程,这三个概念并非同质性的实体。古文化一般用陶器来定义,古城是一种聚落形态,而古国是政治实体,三者之间没有逻辑上的递进关系。“三部曲”的“古国”“方国”“帝国”则缺乏明确的定义或标准将它们作为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区分开来。其次,“新进化论”的酋邦和国家是根据人类学和民族志共时性社会案例总结所提出的术语,具有现代土著社会在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诸多方面的参照蓝图,可以用来作为与考古材料对比的依据。“古国”概念只是文献中的一种称谓,并无明确的科学定义。它也许比较接近早期国家的复杂酋邦,但是无法涵盖从平等社会到早期国家之间所有的社会形态,如初级或简单酋邦。这类等级社会只是某酋长的权威凌驾于几个村落或部落的自治社会之上,<sup>②</sup>离国家形态还相去甚远。

在我国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文明”“国家”“城市”这几个关键概念也未见有很好的讨论,且在科学定义上并无共识。虽然三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但是在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的讨论中,这三个概念往往彼此互换,或用某个概念来论证另一概念的真实性。比如,用青铜器或城市的出现作为文明的标志,或将文明等同于国家。在西方学界,这几个概念也存在定义不同的情况。比如,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用文字的出现来定义文明。<sup>③</sup>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以“城市革命”来指称文明的起源,并列出了十项具体的标准。<sup>④</sup>受柴尔德的影响,中国学者一般根据物质文化的特点来定义中华文明的起源,常见的标准是青铜器、城市和文字。最近,中国学者提出的四项标准是:生产力发展,出现社会分工;社会阶层和阶级的明显分化,出现王权;人口集中,出现城市和大型公共建筑;国家出现,暴力和战争成为普遍现象。<sup>⑤</sup>

一些西方学者对这些概念提出了较具体和更明确的定义。比如,布鲁斯·特里格指出,某些术语必须赋予定义,这尽管有点主观,因为存在一种将文明发展、国家起源和城市兴起大致看作同义的趋势。实际上,文明是文化发展的层次,是指那些达到较高道德标准和艺术成就的复杂社会。国家是政治结构,指具有强制性手段和永久性领导权的社会。而城市是一种聚落形态,表示社会分层和经济发展导致政治或军事的向心集中。<sup>⑥</sup>

由于文明起源是一种社会文化从原始到进步的发展过程,一般表现为一种社会复杂化的趋势,而国家是指某种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府机构的出现。虽然文明与国家两者存在密切的关系,但是从概念和科学定义上而言两者还是存在一定差别,最好把它们作为两个问题来探讨。

## 二、研究方法剖析

我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偏好“二重证据法”,就是用考古发现来论证史籍上提到的国家和朝代,特别是三代的夏商周。考古学者采用时空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来对应文献上的早期国家,而历史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② 乔伊斯·马库斯《社会进化的考古学证据》,陈淳译,《南方文物》2009年第2期。

③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④ V. G. Childe, “Urban revolution”, *Town Planning Review*, Vol. 21, No. 1, 1950, pp. 3-17.

⑤ 王巍《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求是》2020年第2期。

⑥ B. G. Trigger, *Beyond History: The Method of Prehistor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8.

学者则把历史记载的某些地名和事件比附和对应一些考古遗址和发现。比如用二里头文化对应夏文化、夏民族和夏朝的疆域,认为陶寺遗址是尧都,石峁遗址是黄帝部落的据点。

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家用来处理材料的基本工具,它根据“相似即相近”的原理用类型学将考古材料归类,以便建立文化的发展序列或年表,并用传播论追溯它们之间的时空关系和源流。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1925年出版的《欧洲文明的曙光》一书中,率先用文化单位来构建欧洲的史前史。在《史前的多瑙河》一书中,柴尔德为考古学文化下了一个定义,这就是“总是反复共生的某些遗存类型——陶器、工具、装饰品、葬俗、房屋式样。”<sup>①</sup>根据夏鼐的观点,安志敏为考古学文化所下的定义是“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sup>②</sup>

起先,柴尔德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与史前的族群对应。他说“文化是一种社会遗产;它对应于享有共同传统、共同生活机构及共同生活方式的一个社群。这群人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称为某‘人群’,于是考古学家就能够将一种文化对应于该人群。如果用族群来形容这群人,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史前考古学完全有望建立起一部欧洲的民族史。”<sup>③</sup>后来他对这样的做法表示了怀疑,认为将考古学文化与所知的族群相对应是一个推测性做法,这一做法十分危险。<sup>④</sup>它也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国家,例如,当苏美尔分裂为多个相互敌对的独立城邦时,考古学家只能分辨出一个苏美尔文化。于是,考古学文化在社会学上的对应者只能由“人群”这样一个不承担任何义务的词汇来指代。<sup>⑤</sup>

中国学者通常以一种不言自明的态度来运用考古学文化概念,将它指称从旧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的各种考古材料,并没有在意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以及针对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出土材料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分类和考古学文化只是一种处理材料的工具,它是以排除差异,挑选共性的方法对器物归类,以便将物质文化令人棘手的多样性缩小到便于掌控的范围之内。第二,在具体操作中,物质文化被作为静态和孤立的特征来对待。于是,考古学文化被比喻为鸽子笼,或是像将器物按不同标准归类的混装口袋。<sup>⑥</sup>第三,考古材料的分类和文化的命名是一种高度主观性的操作,这种人为确立的历史关系很可能是一种与真相有别的“错觉”。第四,将考古学文化看作是有边界的同质性实体。其实,不同类型的器物有不同的功能、分布范围和传播机制,不同文化之间可能存在重叠或渐变的过渡。第五,文化、社群及政体的分布和运转并不重合,某些文化特征的分布可能要比社群和政体的范围大得多。<sup>⑦</sup>第六,考古学文化概念比较适合研究小规模、同质性和较为定居的社会,比如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它不适于研究复杂社会,像在国家这种社会里,社会分化会产生异质性。这种情况使得考古学文化在讨论许多关键问题时变得毫无价值。<sup>⑧</sup>

英国考古学家希安·琼斯指出,物质文化是多义的,它的意义因时而变,取决于它特定的社会历史、特定社会参与者的立场,以及它所直接应用的社会背景。而且,物质文化不只是涵义累加的仓储,它在社会实践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物质文化的共性不管是相同文化的适应还是共同习俗的

① V. G. Childe,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pp. v - vi.

② 安志敏《考古学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6、367页。

③ V. G. Childe, "Races, Peoples and Cultures in Prehistoric Europe", *History*, Vol. 18, No. 71, 1933, pp. 198 - 199.

④ V. G. Childe, *The Aryans*, Kegan Paul, 1926, p. XII.

⑤ 戈登·柴尔德《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方辉、方堃杨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02—103页。

⑥ M. Johnson,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Wiley-Blackwell, 2010, p. 24.

⑦ 布鲁斯·C. 特里格《社群的概念》,布鲁斯·C. 特里格《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页。

⑧ 布鲁斯·C. 特里格《从历史视角看考古学的主要概念》,布鲁斯·C. 特里格《时间与传统》,第100页。

产物,它们未必代表过去自我意识族群分布的范围和边界。<sup>①</sup>

文明与国家起源是一种社会不断复杂化的过程,一般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社会成员身份和职业的“多样化”或“异质性分化”,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的“不平等”或“等级性分化”。这两个变量使得社会结构在横向和纵向上的特化,导致社会功能和社会机制的多样化和差异化。<sup>②</sup>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社会与人群同义。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里,狩猎采集群的家庭和农业的村落从事的是相同的工作,使用相似的工具和器物。他们之间的差异很小,基本上是一种自治和同质性的社会,但是在地理隔绝的情况下会表现出区域性的文化差异,如果从考古学文化观察这类社群,不同地区之间的物质文化会存在相当大的差别。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积累,社会内部开始分化和复杂化。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新事物的发明,比如金属冶炼、轮车和驮兽、犁耕、历法、文字,等等。最重要的是社会职业及等级的分化,一些控制基本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源的人成为管理阶层,社会不平等出现。贸易、手工业专门化、大规模劳力的调遣促使社会形成管理系统,过去相对独立和自治的社群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不同的社群逐渐融入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和交换网络。同时,战争、营造大型防卫建筑和征募军队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集权,国家便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形成。如果我们用排除差异、按共性归类和静态的考古学文化去分析不断复杂化和等级分化的文明发展过程,显然是不适当的。

科学常用类比方法进行研究,从已知推断未知,我们用考古学文化来对应族属乃至国家与疆域,这种类比并非以实证为基础的逻辑推理,而是一种猜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以一组陶器类型为前提的考古学文化,依次推导出夏族、夏国及夏朝疆域等结论来。

中国学者基本采取经验主义的归纳和描述,缺乏理性主义的逻辑实证分析,也缺少怀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维。受国学的影 响,我们偏好文献研究,信奉“二重证据法”,强调史料在文明与国家起源中的核心地位,对疑古的科学精神持保留态度。这种研究的问题大多局限在何时、何地、何人的范围,缺乏对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动力和过程的探究,缺点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我国文明和早期探源亟需方法论上的创新和突破。

### 三、国家:血缘关系变为地缘关系

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需要从不平等起源的源头上了解,将去个人化或制度化的不平等看作是 社会复杂化的起源。这种制度化的不平等造就了长子继承制和世袭不平等的出现,然后是整个社会分层的形成,酋邦社会的出现。国家的起源则以酋邦的血缘世袭体制被官僚体制取代为标志,也就是社会管理机制从血缘关系变为地缘关系。

人类有极为漫长的时间处于平等社会,涵盖了几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和部分新石器时代。所有的游群都是以野生资源为生的社会,但是并非所有觅食者都是游群。比如,北美西北沿海以捕捞鲑

<sup>①</sup> 希安·琼斯《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陈淳、沈辛成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50、156页。

<sup>②</sup> R. H. McGuire, “Breaking Down Cultural Complexity: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 6, 1983, pp. 91 - 142.

鱼维生的印第安人社会就发展到了酋邦的层次<sup>①</sup>，而美国佛罗里达卡卢萨的狩猎采集者发展到了国家社会。<sup>②</sup>

平等社会的核心是平均主义，也即互惠经济。狩猎采集是一种直接回报经济，自然资源的波动和不确定性，使得社群生存始终笼罩在短缺和不确定的阴影之中。平等互惠是出于一种自我服务的投资，即与别人分享食物，可以使对方承担起自己陷入困境时救助自己的义务。早期农业导致了土地载能的提高，使得社群能够逐渐定居下来，人口增加。农业是一种回报滞后的经济形态，虽然能收获比野生资源更多和较稳定的食物，但是仍然存在歉收和饥荒的风险。所以，即使农业社会也不一定导致不平等的出现。

但是，农业的发展确实令社会行为发生了改变，比如各个家庭开始储藏食物，不再慷慨分享。人们容忍成功家庭积累食物和财富、开始购买牲畜并实行多妻制。随着剩余产量的提高和财富的积累，一些人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比如慷慨大方、善战勇敢、足智多谋、宗教仪式和治病占卜来获得声望。还有一种获取和提升威望的常见途径就是“夸富宴”，它被富人用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并羞辱和贬低潜在的竞争对手。不平等的出现导致了一种财富的转移，社会出现了不对称的关系。成功家庭通过对财富、奢侈品和知识产权的垄断和世袭来维持自己的威望和地位，而贫困家庭则愿意接受富裕家庭的仆从地位来换取食物、住所和保护。当具有财富和威望的夸富者成为部落首领后，就希望能够将这种财富和地位传给他的儿子，但是无法持久。因此，要维持永久的世袭等级地位，就要借助神祇的力量。<sup>③</sup>在向世袭等级社会的转变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原来社群集体供奉的神祇被某特定世系和家族所垄断，这个首领世系的祖先成了神祇的后代。社会的逻辑也变为财富、权力和地位并非来自世系和家族的努力，而是来自神的惠顾，于是贵族阶层和平民之间出现了一条断裂的分界，表现为：1. 首领是神的后裔；2. 贵族世系永久世袭；3. 贵族之间保持族内婚，与平民隔离。<sup>④</sup>

要了解酋邦与早期国家的区别，就有必要弄清在酋邦向国家的转变中社会性质究竟发生了哪些根本的改变。美国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利和乔伊斯·马库斯对夏威夷、祖鲁、罕萨和马达加斯加民族志案例的考察表明，没有一个王国是某等级社会简单变大的结果；相反，四个王国都是通过武力吞并一批敌对酋邦后形成的。<sup>⑤</sup>早期国家的缔造者并无先例可循，他们当时可能只是想压倒自己的对手，并没有想要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当他确立了凌驾于其他酋邦之上的统治地位，便需要一个比酋长更高的头衔——“国王”。当“国王”通过任命亲信来管辖各个被征服的行省，进而瓦解各地酋长世系的血缘等级制度时，一个官僚体制的国家就形成了。所以，莫顿·弗里德将国家称为“超越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sup>⑥</sup>卡尔·魏特夫说“国家是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政府。”<sup>⑦</sup>这就是国际学界所公认的国家是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的结果。

① Elman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Random House, 1962, p. 60.

②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陈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87—492页。

③ K. Flannery & J. Marcus, *The Creation of Inequality, How Our Ancestors Set the Stage for Monarchy, Slavery and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71-83, 198.

④ K. Flannery & J. Marcus, *The Creation of Inequality, How Our Ancestors Set the Stage for Monarchy, Slavery and Empire*, pp. 313-323.

⑤ K. Flannery & J. Marcus, *The Creation of Inequality, How Our Ancestors Set the Stage for Monarchy, Slavery and Empire*, pp. 341-362.

⑥ M.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andom House, 1967, p. 229.

⑦ K.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39.

## 结 语

现代科学主要是在西欧发展起来的,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将科学方法论作为科学哲学来研究,一直发展到以伽利略和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诞生。科学研究离不开哲学认识论的指导。古代科学方法基本是靠经验直觉,或立足于直觉的思辨方法。而现代科学虽然也凭借直觉,但是也以其他精致方法为基础,单凭直觉会把人引入歧途。中国的传统史学基本上是一种缺乏理论的直觉研究,用张光直的话说,就是“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达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sup>①</sup>这种传统方法的缺点在于讨论的方式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认识上依赖直觉,方法上依赖表象的归纳和总结。如果不采用严谨的实证主义方法,通过证据链来进行逻辑推理,是难以探究事物的真相和现象的因果关系的。

我国文明探源在科学方法上存在先天不足的薄弱环节,这就是缺乏理论指导,将进化论的规律性研究与历史学的特殊性研究混为一谈;对许多关键概念没有严格的定义和明确的区分;还有过于刻板 and 过时的入手方法,如“二重证据法”和考古学文化分析。这种做法的结果,一方面是大部分研究只不过是自说自话的个人观点,并且对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停留在表象分析的层次,难以深入到因果机理的剖析或提高至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便是我们的研究成果难以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无法进行平等的对话。

文明探源是世界性的课题,而民族国家仍然是我们进行比较分析的主要坐标。如何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我们文明探源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正如俞可平所言,人文社会科学具有超越国家的普遍原理,离开这些原理就无所谓科学。言必称三王,行必提尧舜,带着沉重的怀古情结来观察和评判现实是我们传统的思维定势。<sup>②</sup>我们在进行纵向思维的同时,也需要进行横向的比较,即跳出自己狭隘的历史经验,虚心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这才是使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使中国的学术智慧成为全人类文化结晶的必由之路。

## 文明史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方法刍议

张国刚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人类创造了文明,文明各有特色。这些特色,是不同地域、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曲折的时光隧道中,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独特呈现。文明总是在交流、互鉴、冲突、融合等相互关系中经历着成住坏灭、涅槃重生。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一部分,文明史的研究方法与历史研究的方法总体而言具有一致性,比如遵循唯物史观、注重文献、重视考据和义理,等等。但是,正如每一个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方法各有偏重与特点一样,文明史作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模糊的学科领域,其学科定位与研究方法,值得进行深入讨论。

<sup>①</sup> 张光直《序言》,布鲁斯·G·特里格《时间与传统》,第1页。

<sup>②</sup> 俞可平《全球化与中国学术》,《文汇报》2008年7月6日。